

他们的故事——献给自愿无偿捐献生命礼物的人

编者按

1982年至今,在上海,累计8527人捐献遗体,243人捐献角膜,还有3万余人也已预签了这份特殊的“遗嘱”。然而我们无法计算的是,因为他们的奉献,有多少学生成长为了合格的医生,治愈了多少病人,延续了多少生命;我们无法计算的是,因为他们的奉献,有多少眼疾患者得以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

他们相信科学,正确对待疾病与死亡,把自己的遗体作为奉献给人类的最后的礼物。他们坚守承诺,在艰难求学的道路上感恩前行,将对生命的敬畏化为医治伤病的仁心仁术。他们默默无闻,却用一个个生命故事、一个个大爱善举,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感动着每一个人。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他——为了更多父母不再流泪

2004年,刚刚参加工作两年的龚晓敏被确诊换上了霍杰金淋巴瘤晚期。在治病的过程中,许多好心人都纷纷伸出援手。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患病之身不能对社会有所作为,而遗体却可以为医学实验作贡献,眼角膜可以让盲者复明。如果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国家,那我岂不是虽死犹生?”龚晓敏曾这样告诉父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打算死后捐献遗体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父母的态度从开始的反对慢慢转变为赞同,并且在儿子的带动下,也做出了身后捐献遗体的决定。

随后,晓敏去红十字会领了三份《遗体捐献志愿者表格》,当填好需要直系亲属签字的时候,却出现了一点状况。亲属们都认为孩子已经很不幸了,如果死后再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那岂不是“死后尸骨不安”?大家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还批评夫妇俩昏了头,怎么能如此对待孩子和自己的身后事?甚至还有人质问:“你们是不是打算将来把遗体卖给国家,然后换钱给孩子治病?”

种种话语和问责似尖刀一样深深地刺痛着晓敏父母的心。他们只是笑着解释道:“这是无偿自愿的善举。哪个父母愿意用自己独生儿子的遗体去换钱?”

这时,晓敏站出来:“我已经确诊换上了不治之症,看着父母悲痛欲绝的样子,我好伤心好无奈。如果医学界利用我的遗体做研究,能让其他人减少得病的几率,不再让别的爸妈为了患病的孩子伤心,岂不是很好吗?”

在晓敏一番真情的感动下,亲属们含泪在“执行人”一栏签下了他们的名字。

2007年12月31日,龚晓敏平静地走完了自己年轻的一生。他的父母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无偿捐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他们——在感恩中修炼行医之路

他们是医学院的学生,在课堂上与“大体老师(对人体解剖学遗体标本的尊称)”相遇,从此了解了人体的许多奥秘。

人体解剖学的第一课上,拉开拉链的那一刻,学生们纷纷不由自主地心头一紧,三分钟的低头哀哀让他们想到很多。没有人知道大体老师的准确姓名。默默无言,是大体老师和他们特殊的交流方式;大胆展示,是大体老师引导他们探索真理的教学方法。

第一次见到大体老师的时候,学生们都不免有畏惧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由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命的敬畏。

每当课程结束,送别大体老师的最后一堂课上,他们都会用鲜花和感恩卡表达自己的敬意。不少学生在写完感恩卡,献完花后,甚至会突然舍不得离开解剖教室。

一位学生在感言中写到:“大体老师,您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是您的无私和豁达为我们铺平了艰难的学医之路,我仿佛能触摸到您冰冷身体下那颗温暖的心……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成长为帮助更多人活得更好的白衣天使。”

她——我愿成为你的眼

她叫崔蓉芬,是上海市回民中学的一名退休保健老师,曾三十多年如一日以少数民族学生健康为己任,桃李满天下;她开明、知性、勤劳、俭朴、坚强、善良。

2006年的一次家庭聚会聊天中,看到有关中国角膜捐献缺乏,很多人在黑暗中苦苦等待的新闻,她就和家人谈起眼角膜捐献的事情。她主动提出百年之后也要捐献角膜,帮助别人重见光明,并让儿媳帮忙办理捐献登记事项。家里人对她的想法都很支持。于是,家人在金山区红十字会为她办理了登记手续。当拿到那本登记证书时,她像收藏宝贝一样收藏了起来。

2010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崔蓉芬突发脑溢血,送到华山医院只坚持了4

天就安静地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享年73岁。在金山区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的家人联系上了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及时完成了角膜摘除手术,实现了老人的遗愿。

第二天,医院派人亲自上门送来了捐献证书,并告知已经为1位患者完成了移植手术。那一刻,大家心中充满了安慰。

崔蓉芬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用自己的一生来诠释博爱和奉献。社区孤老的家中有她的嘘寒问暖,街道的活动中活跃着她的身影,医院的病房是她做义工的天地,退休之后也一直在为社会无私奉献着。如今,她用生命作为最后的礼物,为他人带来了光明!



图为市民在福寿园遗体捐献纪念碑前祭扫亲人

他们——365天24小时待命

他们是遗体接受站的工作人员。全天24小时,全年365天,这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平时,他们的电话24小时不能关机,充电器随身带,因为随时随地可能接到执行人的电话,并且要尽快赶到现场。从高层楼道运送遗体,饿着肚子赶路,基本上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上海中医药大学工作站的向培海老师说:“遗体捐献者去世后,是家属感

情最脆弱、最容易波动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接运遗体,往往还要想办法慰藉家属。特别是有的人,对已故亲人的捐献意愿从情感上还是过不去这道坎儿,他们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各种挑剔甚至指责。这些,我们都能理解。比起那些遗体捐献者及其家属的情怀,我们这点苦和累都算不得什么。”

对于家属们的要求,工作人员都会

专门记录在本子上,并且最大限度地去实现他们的愿望。

不久前,上海中医药大学将学生的体会编成一本小册子——《心路》。一位遗体捐献者家属阅读后说:“原以为家人捐献遗体只是为了让医学生学到更多的医学知识,没有想到还能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如此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更加能够理解家人所作出的奉献了。”

接受站工作人员朱青春老师感慨道:“能够得到遗体捐献者及其家属这样的理解,能够看到学生由于我们的工作而有所进步,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

她——奔跑的志愿者

金莹的故事,要从她的大舅舅,蒋百平说起。

自幼患病的蒋百平,因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加之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导致了严重的后遗症,丧失了劳动能力,也始终没有成家。在突破了层层传统观念的阻力后,他于1986年填妥《遗体捐献登记表》,成为嘉定娄塘地区生前办理遗体捐献的第一人。1993年6月,蒋百平逝世。他的遗体被当时的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接收,用于医学研究。

对于大舅舅的勇气和魄力,金莹表示非常敬佩。自此之后,家族里不少人也纷纷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的行列。在长辈的影响下,2008年,金莹走进嘉定区红十字会,妥办了遗体捐献手续。

如今,金莹的大家庭中已先后有15人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成为上海市遗体捐献登记者人数最多的两户大家庭之一。金莹本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嘉定区遗体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嘉定工业区小组长的重任。62岁的她每天都要做大量的宣传、解释、登记、组织工作。在她的努力下,嘉定工业区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从2013年的29人增至现在的52人。

金莹说,在联谊会组织活动时,大家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大家都觉得,奉献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让生命在奉献中延续,才是生命最完美的归宿。



图为嘉定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遗体捐献者家属介绍遗体捐献知识



图为医学院学生向献血医学事业的志愿者致敬



图为虹口区红十字志愿者向居民介绍遗体捐献知识



因为他子曾捐遗体给国内的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日前,徐汇区红十字会通过邮政方式,向西藏日喀则、云南红河州两个贫困地区发送捐赠衣物5226件,帮助当地贫困人群能够穿上新装。据悉,这些衣物分别由上海学涯教育责任有限公司和马克华菲(上海)商业有限公司捐赠。(薛昌珺)

●3月4日下午,华东师大一附中全校师生进行了传统的爱心慈善义卖活动,并将义卖所得善款5000元捐赠给了虹口区红十字会。丰富多彩的游戏,琳琅满目的商品、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积极参与。(张琦)

●近期,同济大学红十字会组织部分教师参加了上海市红十字会心肺复苏及使用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培训。目前,同济大学已在四平路校区篮球场、游泳馆、人工草场安装了AED,保证学生安全,以备不时之需。(同济)

●3月11日上午,黄浦区红十字会带领街道红十字会干部来到静安区红十字会学习社区红十字服务总站的建设与管理工作。通过实地学习和参观,黄浦区红十字会干部表示,社区红十字服务总站是街道红十字会工作的平台与载体,今年要力争在社区红十字服务总站的建设上有所突破。(黄红)

●3月11日,普陀区红十字会召开急救救护培训师教研会。会议指出,普陀区将把急救培训工作进行进一步向高危行业、特殊行业部门单位推进,并推广安置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开展相关培训。同时还将进一步完善救护培训督导考评制度,不断加强救护培训规范管理,提升整体救护培训教学水平。(姚惠军)

●3月8日上午,松江区红十字会召开2015学年少儿住院基金管委会会议,区红十字会、教育局、卫计委等相关单位管委会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民办托幼机构参保率、保障基金经费合理使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达成一致共识。(张俊)